

第四章 主持淞沪抗战(1931-1932)

一、调停宁粤纷争

1931年间，日本一再在东北制造事端，蓄谋侵略中国。蒋介石正忙于内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曾指示张学良对日本军队要力避冲突。9月18日晚，日本军人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谎称中国军队袭击日本守备队，同时向沈阳中国驻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进攻，然后，又在南满铁路沿线发动全面进攻。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竟未加抵抗，日本军队如入无人之境，一星期内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30多座城市。一时风云变色，局势紧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要陈铭枢率领十九路军打回广东去，并命自己的嫡系蒋鼎文部为后续部队。陈铭枢一面敷衍蒋介石，一面命令部队集中赣州，秘密准备实施与蔡元培、邓演达商定的计划。部署完毕后，他即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报告公开的回粤行动。蒋介石很高兴地同意他立即回赣州去执行预定的计划。9月19日，就在他准备去机场回部队之际，突然接到总司令部参谋长熊式辉的电话，说有紧急要事，蒋要他立即到总司令部去。他即刻赶去见蒋，只见蒋、熊和何应钦三人呆坐室内，神情颓丧，迟迟才拿出张学良的急电给陈铭枢看，方得知日军侵略东北的消息。陈铭枢回忆当时情形说：“我阅毕，极感震动，觉得形势极端严重，立即想到我同蔡元培、邓演达三人的合作计划，现应根本打消。”他对蒋介石说：“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强敌入寇，应当举国一致，共御外侮；而团结全国，首先要求全党团结；目前同西南对立的局面，必须由中央主动解除，争取他们言归于好，非常必要。”^[1]并自告奋勇，愿意到广东去进行调停纠纷的工作。随后，他们为了处理日军侵略东北事件，离开了江西“剿共”前线，乘飞机回到南京。

“九·一八事变”使宁粤对立双方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国难当头的局势，双方都在固守原有立场的同时，作出了和解的表示，以免自己在国人面前处于被动。9月19日，南京方面由李石曾、张继、吴铁城致电广州，称“非和平不能统一，又非统一不能救国，两粤同志如承认和平为前提，而欲达到和平之目的，惟有接受调停之议，从长讨论党国永久和平之道。”^[2]两天后，广州方面通电回应，提出了解决时局的三点办法：1、蒋介石下野；2、广州政府取消；3、以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政府。

9月2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陈铭枢的调停建议获得一致赞成。当讨论调停人选时，有人提出除陈铭枢外，最好加派一二元老，以示诚意，并提出李石曾与张继可出任代表。陈铭枢因厌恶李之为人，表示不愿与李同行，改提与他有过合作关系的蔡元培，得到与会委员的赞成。蔡元培、张继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出任调停，有助于缓和空气。但在调停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陈铭枢，他与粤方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与蒋介石很接近，在当时是一位理想而恰当的人选。

9月24日，陈铭枢同蔡元培、张继自南京到达上海，次日乘轮南下，并先行电告粤方：

“即日来粤，与诸先生商榷救国大计”。28日，陈铭枢一行到达香港，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后加伍朝枢）亦于同日到港，双方立即进行了会谈。粤方提出“马电”（即上述21日通电）三原则，陈铭枢则带来了经南京执监委会议通过，由蒋介石核准的对案，即：1、如粤方能负全责，则中央尽可退让，请粤方来京改组政府，蒋可通电下野；2、如粤方不能负责，则应取消政府，齐集首都，共赴国难；3、如要各方合作，必须来京面商，开诚相见，同舟共济。蒋介石另有一封给汪精卫、孙科等人的亲笔信。请陈铭枢转交，信中称：“弟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弟愿一人承之，谴责之加，何以复求清卸……特嘱蔡、张、陈同志赴港，就商一切。楮笔不能罄弟之血诚于万一，真如必为委曲宣达，且完全代表此间之同志之恳求也。”^[3]这封信也赋予了陈铭枢在调停中的核心地位。

由于蒋介石摆出了一副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高姿态，陈铭枢的使命一时间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经两次会谈，即达成解决办法：由蒋介石与粤方各发通电，引咎自责，蒋下野，粤取消政府；改变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使粤方可安心来京。粤方又提出希望陈铭枢负京沪卫戍之责。这一办法得到蒋同意。30日，蒋介石即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随后又根据粤方的要求，命令十九路军自江西调驻京沪，负卫戍之责。

陈铭枢离开江西以后，一直和十九路军保持着联系。南下赴粤调停前，他有一封电报给蔡廷锴，告诉他“中央派枢为代表，日间南下，与粤当局面商团结大计。”到达香港后他又向蔡通报了会谈情况，并告诫说：“兄的责任重大”，暗示他十九路军在当前时局变动中将承担起重大责任，要有所准备。^[4]陈与粤方达成协议后，十九路军内定调防京沪，10月8日即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准备遵令移防，不久蔡廷锴率部陆续起行。十九路军就成为拱卫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也是陈铭枢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资本。同时，这一调动，为十九路军这支爱国的部队，提供了抗击日本侵略的阵地。

蒋介石既赋予了陈铭枢极为关键的职位，但陈铭枢并未完全理解蒋介石的用意。蒋的高姿态很大程度上是做样子的，他真正需要陈“委曲宣达”给粤方的，关键恐怕还是在于要粤方“取消政府”、“同舟共济”，而不是蒋下野。陈未能领会，反而轻率地答应蒋下台的条件。陈获得京沪要职后，也未能为维持蒋的地位进行斡旋，这使蒋对陈顿起疑心，也为陈此后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30日，陈铭枢等人与汪精卫、孙科同赴广州，与陈济棠、古应芬、李宗仁等粤方全体要员会谈。10月1日，粤方又提出蒋下野通电须于10月5日前发出的条件。蒋介石得到这一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大为恼火，立即回电陈铭枢，表示强烈不满说：“兄等忘前述三原则……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且中央接兄等艳电提议后，以有利党国，且为合作之基础，故立任真如兄为卫戍总司令，此所以不愿有条件，渴望竭诚合作之意也。……尚望兄等本以上之意，与各同志恳切妥商，如期前来，俾得完满解决也。”^[5]粤方不愿让步，改提请蒋先释胡汉民，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粤代表俟十九路军到京沪后再赴沪，商有头绪后，粤方中央委员始入京等条件。至此，由于双方条件相距很大，陈铭枢在粤无法再谈，只好先行回京，待

与蒋介石会商后再作决定。

10月7日，陈铭枢乘轮北返，11日到达上海。他在对记者谈话时表示乐观，认为只要粤方能派代表来会谈，统一局面不难立致，团结御侮，大有可为，并认为“余为传达双方同一要求，真情实意”，俨然以宁粤双方的中间人自居。当时，陈铭枢与蒋介石的潜在矛盾并未公开，同粤方由于历史关系，也尚能有一定的信用，因而在宁、粤两边都说得上话，手中又有一支精兵，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同时，他自己的实力有限，既不是蒋的嫡系，又刚与粤方发生过冲突，因此宁、粤双方都对他存有戒心，粤方将他作为逼蒋下野的资本，蒋方将他作为以粤制粤的工具，他想居间运用，毕竟缺乏一个稳固的根基。然而，陈铭枢早就打算另创一新局面，恰逢风云际会，就雄心勃勃地力图把宁、粤双方揉合到自己希望的轨道上。

10月12日，陈铭枢自沪抵宁，即往见蒋介石，面陈粤方要求，尤其提出释放胡汉民的问题。蒋也知道这是躲不过去的事，便慨然同意了。第二天，陈铭枢就去见胡汉民，详述了这次调停和粤中情况，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得到胡的赞成。随后陈铭枢又陪同胡汉民去会见了蒋介石，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蒋当即决定由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一同陪胡赴沪，等候会晤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陈铭枢一行陪同胡汉民前往上海。

蒋介石释放胡汉民的举动，缓和了粤方的敌意，粤方代表决定北上进行进一步会谈。10月21日，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与张继、蔡元培同船到沪。次日，蒋介石自宁飞沪。在孙科宅邸，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位国民党所谓政治巨头进行了一次少有的会见，包括陈铭枢在内的10余位宁、粤要员参加了会见。

在蒋、汪、胡此次会见中，唱主角的是汪精卫。蒋介石此时正成众矢之的，不想多说。胡汉民知道自己的处境，不便多说。只有汪精卫急于捞一席实权，在中央政府中占有一位置，故最为活跃。汪代表粤方提出三项条件：1、国府虚设，行政院负实际责任；2、废除总司令职；3、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本来按宁、粤双方的议定，粤方代表到沪后，蒋即应发下野通电。在此次会见中，汪未提这点，只对蒋拟的电稿表示同意。蒋介石的目的是恋栈，故对别的事概可表示宽容。他虚情假意地表示：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6]与会者同意，由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会商未决问题。

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但他并无下野的诚意。蒋、汪、胡会见后，宁、粤双方代表于27日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统一政府产生问题，双方分歧的焦点仍在蒋的地位。粤方提出了党政改革方案，意在逼蒋下野。宁方坚持党统与约法，也就是要保持蒋的地位。双方数次会谈未得结果。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方案使蒋介石大为恼怒，他一反以前的态度，复电称：“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以负国人之热望。”并在纪念周公开演讲中声称：“余以为挽救危亡，首在稳定政治中枢，无论如

何，不使动摇。”^[7]蒋公开恋栈，引起粤方极大不满，自11月1日起，会议无形中断。

宁粤双方的对立，使陈铭枢颇感为难。他自告奋勇出任调停，本以为在国难当头之际，双方会以大局为重，不料双方对权位都志在必得。他是南京的代表，自然要为蒋介石说话；但他与粤方的历史渊源，又使他不能对粤方一味强压。陈铭枢只能奔走其间，尽力调和。他一方面回宁向蒋陈说形势，劝蒋暂时引退；另一方面向粤方解释，蒋的言论是一时意气，不足介意，经各代表劝说后，态度已见缓和，和议前途不致有何障碍。经过陈铭枢等人的努力，宁粤和平会议于11月7日重开，并在当天草草收场。会议对政治、军事、财政诸问题均未达成一致，只决定宁、粤各自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推举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再由四届一中全会讨论未决问题。11月12日至23日、11月18日至12月5日，南京、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会议上，粤方的地方实力派与汪精卫派又因上海会谈未提蒋通电下野一事而分裂，汪派退出会议，另行于12月3日在上海开会。如何将这三方捏合在一起，仍是国民党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政坛枢纽

国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成三派，演出了一幕乱哄哄的闹剧，围绕蒋介石下野的分歧，也未能消除。粤方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坚持“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的立场。按照上海和议的决定，未决问题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粤方中委不来，全会就开不成，国民党不能团结，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蒋介石也就无法向国人交待。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能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做下野的打算。

12月10日，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4人代表粤方到达上海，在与陈铭枢的谈话中，他们表示四届一中全会的召开将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陈铭枢在事前已与蒋介石商量过了，他代蒋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可以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双方当晚商谈的结果是，蒋下野后，国府主席及行政院长的代理人选，必须得到粤方同意，同时达成默契，由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的职务，他自己认为“全属于粤方的主张，而蒋亦要我来缓和双方的争议”。^[8]这是他出任调停的一个逻辑结果，不过这也并不排除他还有自己利益的考虑。陈铭枢当时似乎很希望为十九路军也为自己谋一出路，他已经感到十九路军缺乏地盘的危险，他前次与邓演达的联合便透露出了一些讯息，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要谋得自己实力的发展。然而，陈铭枢发展自己实力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疑心。陈铭枢参加宁粤和议，本来是蒋以粤制粤的一着棋，可是他的行动，很容易被蒋疑为偏袒粤方。尤其是对粤方要求蒋下野一事，似未见陈有反对的表示，相反，蒋下野后他即欣然同意接任蒋的行政院长职务，这自然要遭到蒋介石的疑忌。蔡廷锴对要蒋下野一事，曾不以为然。他认为粤方要求过苛，在10月上海会谈期间，他对陈说：“下野之事我认为不可，万不能允粤方之要求。若然，结果又是分裂。”当时陈“微笑不答。”^[9]可见，陈铭枢是有

自己独立的利益权衡的。另一件使蒋不快的事是国府主席的人选。蒋本来想下野后让于右任干，陈却推荐了林森。林很超然，但与蒋的关系显然不如下。蒋当时不便驳陈的面子，陈事后承认自己“心粗”，没多注意蒋的态度，但蒋不会不把这些事记在心里。陈、蒋的亲密合作关系，已经由亲转疏，并且开始进入了走向冲突的路径。

12月14日，陈铭枢与蒋介石密商后自宁回沪，给粤方带来了蒋介石即将辞职下野的信息。次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称：“现在国是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以维团结而挽危亡。”^[10]至此，纷繁扰攘了大半年的宁粤对立，终以蒋的下野而告一段落。当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任命林森为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为代理行政院长。林森、陈铭枢立即发出就职通电：“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惶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铭枢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对于施政大端，一切维持现状，无所更张。即望第四届第一次全会早日开会，政府正式改组，俾定党国大计，安内攘外，全国一德一心，共策前进，俾森、铭枢早卸仔肩，用免陨越，至深切禱。”^[11]

行政院是实际行使国家权利的中枢机构。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一时间执掌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但以他的实力和资望，还只能负过渡时期看守内阁的责任，无权号令各方。况且，蒋介石在下野前对自己的复出已预有布置，为此，对新内阁设置重重障碍。行政院各部主管，亲蒋派不用说，纷纷撂挑子不干，以示与蒋同进退；即便非亲蒋派，也对未来意存观望，袖手作壁上观。因此，行政各部部长及部内司局长，无待批准，不等接收，便纷纷辞职，一走了事。外交部长顾维钧去了上海，财政部长宋子文声明只负责到一中全会开幕时，财政部科长以上人员一走而空，机关犹如空城。内阁陷于瘫痪，陈铭枢无可奈何，他这个“代理行政院长”，事实上并无行政事务可行“代理”之责，连个“代理”也只是虚名而已，只好坐待四届一中全会的召开。

陈铭枢当了十几天代理行政院长，使他认识到孤掌难鸣的痛苦。蒋介石地位不是轻易可以摇动的，而更令他震惊的是邓演达的死。陈铭枢与邓演达的军事合作计划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而且，邓演达在事实上已于8月17日在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所逮捕。陈铭枢到南京担任要职后，邓演达的哥哥邓演存来找陈铭枢，希望陈设法营救。陈深知蒋的习性，若他再出面营救，只会对邓更不利。但陈对时局很自信，他把希望寄托在蒋下野之后，政府改组，邓就可以重获自由了。所以，他自信地对邓演存说：“蒋介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敢对择生怎么样吗？请放心，到了时候，择生就会出来。”^[12]然而陈铭枢身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对邓的囚禁地点与现状毫无所知，他的希望并无可靠的保证。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下令在南京秘密杀害。当朱蕴山闻讯向陈询问时，陈还说：“我当卫戍司令，难道处死一个人，我还不知道吗？”陈后来去问蒋：“择生囚禁在什么地方？他现在是应该释放的时候了。”蒋还虚情假意地哄骗他说：“熊参谋长（式辉）在办。”^[13]

等到陈铭枢得知邓演达已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时，激愤不已，当即拿出2万元为邓料理后事，并亲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这件事使陈铭枢更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是促使他此后反蒋的关键因素之一。蒋介石可能已经发现了陈铭枢与邓演达的密谋。陈和邓有过密信往来，虽用的是暗语，却是亲笔。有人告诉陈，邓被捕时曾在他身上搜出陈给他的信，并说这是蒋杀邓的主因。但陈铭枢推测，即使蒋发现此事，也应是以后的事，否则以蒋的疑心，决不会同意十九路军调驻京沪一线。但不管怎么说，邓演达案是蒋、陈关系急转直下的关键因素。

蒋介石下野后，留沪、留粤中委纷纷到南京。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在参加了开幕式后即飞往老家溪口“静养”，汪精卫、胡汉民则仍称病滞留沪、粤，孙科成为全会主角。会议通过了修正后的“中央政制改革案”，决定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五院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28日，全会通过中执会常委人选、国府委员人选、五院院长人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1932年元旦，新任人选全体宣誓就职。

孙科政府名为蒋、汪、胡三巨头合作的产物，号称统一合作政府。然而蒋、汪、胡三人分居三处，貌合神离，各有打算。蒋介石手握实权，一面对孙科拆台，一面拉拢汪精卫，作卷土重来的准备。孙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外交两大难题无时不困扰着他。外交面临着日本在东北步步扩大侵略，在上海加紧挑衅，形势日趋紧张，应该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为国内外所瞩目。新任外长陈友仁力主对日强硬，但得不到党内实力派的支持，愤而辞职。财政更是一筹莫展。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从宋子文手中非但得不到分文现金，反接下了1000万欠债。由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影响力，上海银行界对孙科政府持不合作态度。各省税款收不上来，财政部的款项只够4天的开销，而催款者不断，使财政部穷于应付。陈铭枢和孙科曾有提用公债基金、暂行停付内债本息的拟议，事未遂行即遭上海及各地银行界的强烈反对。即便是陈铭枢的十九路军也深受无钱之苦，面临着断炊的困境。蔡廷锴找陈想办法，陈“似亦无甚办法”，表示因政府改组，“凡事均无头绪”，要蔡去找军政部长何应钦，结果使蔡误以为“陈部长亦是对我敷衍了事，未必会能替我们想办法了。”^[14]对陈大发脾气，扫兴而归。十九路军的经费只得靠宋子文与广东方面的接济，这无异是对陈铭枢奔走劳顿的一大讽刺。

面对这一堆烂摊子，孙科一气之下撒手而去。1月9日，孙科离宁赴沪，行前称：“余以一无力量者，而强以负最大之责，势必至于竭蹶而后已，于国事决无补也”。^[15]接着，黄汉梁亦于13日挂冠而去。政府形同瘫痪，以至陈铭枢这个副院长也不知院长的下落而去四处打探。孙科上台本来被认为是粤方的胜利，陈铭枢在孙上台之前，曾有孙科掌政，自己专任军职的想法。但孙科硬拉他入阁，他“为了贯彻初衷，故只得硬着头皮同孙合作”。对于政府面临的困难局面，陈铭枢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讲时曾慷慨激昂地说：“看现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渐至山穷水尽，如革命重心不能建立，听其沉顿下去，即将无

声无息地完了。我们必要挽回逆流，重新激起，否则便无法挽救。”“万一三领袖不来，或迟迟其来，重心不立，政府不固，我们也不能等死。无论如何要撑起来向前拚命，为党国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成败利钝，生死存亡，在所不计。如不能复活民国十四五年的革命激情，这个退潮，就挽不起了。大祸临头，迫不及待，大家要一齐振作起来，去求我们的生路。”^[16]

陈铭枢基于上述态度，为挽救局面作了一系列努力。他首先与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合作，并得到孙科、陈友仁、邹鲁等人支持，于12日成立了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特委会由孙科、陈铭枢、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以及于右任、张静江、张继、居正、何应钦等人组成，在蒋、汪、胡三常委“未实行责任以前”，“迅速处理政务”，“负其责任”。这是陈铭枢重建政治中心的关键一步，也许他内心里未尝没有以此取代蒋介石等的想法。当时一般人都将稳定局势的希望寄托于蒋、汪、胡三人进京之上，陈铭枢也曾致电三人称：“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机关，提挈无人，失其重心，一切安攘大计，何所秉承？”^[17]但从陈的行动来看，他的活动重心显然不在催三人回京，而在如何开创一个新局面，这又扩大了他与蒋介石之间原已出现的裂痕。陈铭枢知道，他的行动“以个人利害言，不免徒作牺牲；以时论是非言，岂能尽求谅解”。^[18]但他仍“不敢言去，殆至力尽能竭，贡献无路，然后奉此待罪之身以退，付诸国人论制。”^[19]

对于最使政府头疼的财政问题，陈铭枢也主张以积极态度处理。他对孙科说：“政权在我们手里，操刀必割，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吗？”并表示财政部长一职如果没人干，他可以来干。接着，陈铭枢与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张嘉璈、李铭、王晓籁等人见面，对他们说：“政府为了维持国家政权，不能因为你们不合作而垮台。我们是革命政府，事情办不通，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来处理。”^[20]也就是说，他要运用军事强力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上海金融界为了避免一个职业军人担任财政部长可能带来的危险，决定让步，同意每月负担900万经费，加上税收700万，勉强可以维持孙科政府的各项开支。

陈铭枢的种种努力，虽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他毕竟缺少雄厚的政治实力，常有“心劳力绌，束手无策”之叹。就在他奔波于前台之际，国民党内的政治气候又在酝酿着新的变化。蒋、汪、胡三巨头中，胡汉民在广东，更多的是依靠粤系实力派，以自保求发展。汪精卫一派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宁粤对立时，汪派对和谈“最感兴趣”，目的就是借机在权力角逐中分一杯羹。最具实力的蒋介石本来就不是真心下野，用陈铭枢的话说是“身在奉化，眼在南京，手在上海”。蒋注意到了粤方阵营中的不同派系之争，对汪派刻意拉拢，以拆散汪胡联盟，为己所用。且汪派虽有野心，但无军事实力支撑，拉拢汪派，既可以为蒋分担政治责任，又便于蒋控制而不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自蒋、汪、胡上海会见后，蒋便对汪派作出一系列姿态。汪派四全大会所选中委，是由于蒋的极力维护才被一中全会所接纳。蒋在下野回奉化前，又约汪派大将顾孟余、陈公博等谈话，表示“本人甚盼汪先

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并肉麻地说：“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21]政客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又一次露骨地表现出来。蒋的拉拢果然见效。孙科本是汪精卫反蒋时的盟友，而当孙科内阁困难之际，汪精卫竟不施援手，坐观其败。等到孙科上台半月，内外交困之时，蒋介石觉得时机已到，即于1932年1月15日，将一封亲笔信交来杭汇报的陈铭枢转交汪精卫。次日，汪即抵杭与蒋晤面，达成了两人分掌军、政，重返政治舞台的默契。18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5人在杭州西湖烟霞洞会谈，讨论党政方针，奠定了蒋、汪合作的基础。汪精卫、蒋介石于20日分别回南京。24日，外长陈友仁因对日绝交方针未获内阁同意而辞职，次日孙科亦辞职赴沪，孙科内阁垮台已成定局。

蒋、汪携手后的一系列政治策划，陈铭枢被撇在一边，他联络各方、维护孙阁、另立局面的想法很难再继续下去。说到底，除了十九路军以外，陈铭枢手头并无多少政治筹码，他只能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隙缝中，纵横捭阖，争取活动空间。蒋、汪合作，孙科退步，他的活动空间也就被压得几近于无了，陈眼看着自己成为政坛的牺牲品而无可奈何。更糟的是，陈铭枢几个月来独行其是的活动，逸出了蒋介石所能控制的范围，使蒋介石深感陈铭枢不再是自己手中的一张对付异己的王牌，因而开始对陈有所戒备。与汪精卫不同，陈手中有一支能战部队，他的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位置重要，京沪地区所有军警宪特机构名义上均受其节制。虽然1932年1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蒋光鼐为司令长官（蒋未到任前，由邓世增代理），但谁都知道陈仍然控制一切。政治经验丰富的蒋介石，深知军队的重要，最嫉视别人拥有武力，他容纳了汪派所有中委，唯独拒绝了本非汪派不过挂名的四川将领刘文辉，可见其心机之细微。他不能容忍自己眼皮底下有陈铭枢这样的武装部队，作为异己的力量存在。宁粤议和，蒋、汪合作之后，陈铭枢原有的活动空间已经失去，蒋介石可以从容地对付只有区区不足道的政治势力的陈铭枢了。蒋回南京后，阴阳怪气地对陈说：“陈长官，我是在野之身，只有听你的了，你怎样处置我呢？”此话半是玩笑，半是试探。陈回答说：“你还是中央三常委之一，我仍是听你指挥的。”^[22]双方都觉气氛尴尬，话已经谈不下去了。蒋复出前的活动，已使陈铭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此后国民党中央与行政院的各种会议，陈铭枢虽照常出席，但他承认自己没有前一时期活跃，会外经常打交道的也是李济深、冯玉祥等非实权派。他回忆当年的感受说：“心情是极沉重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如果不是十九路军驻在京沪，我随时可能步择生的后尘。”^[23]

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消特务委员会，28日，中常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院长，政局又为之一变。就在当晚，淞沪抗战打响，历史又从另一个角度将陈铭枢推上了前台。

三、部署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东北扩大侵略，不足3个月就基本上占领了东北全境；另一方面图谋在上海制造事端，在这个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对

中国施加压力，既可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让步，又可扩大在上海的侵华势力，同时，更着意于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的注意力，可谓一箭三雕。在日本的蓄意挑动下，上海形势日趋紧张。

十九路军自调防京沪一线后，便直接面对着日本的压力。据陈铭枢说：“蒋光鼐对政治向不热心，惟对于抗日救亡则无比积极。”“蔡廷锴富于民族思想，有强烈的爱国主义。”^[24]蒋、蔡基本可称为职业军人，对国民党政客们你争我夺的闹剧很不以为然。十九路军调防之后，蒋光鼐本在上海养病，没有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廷锴处理日常军务，但因政局变化不定，全军经费无着，又居上海浮华之地，令蔡“颇觉厌闷”，“终日抑郁不安”。在一次与陈铭枢的谈话中，蔡廷锴抱怨说：“我军虽然在国内打败过一些精锐队伍，但还不曾同外国作战过一次。现在想起，都是罪过。我们过去的苦是白受了，精力是白费了。”^[25]对内战深为厌恶。当时正值日军侵犯黑龙江，马占山部不顾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江桥抗战，名扬全国。在东北地区，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抗日义勇军不断涌现。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3人也曾商议组织义勇军北上，准备由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3个师中各挑出2000人，编为2个独立旅，以义勇军名义到东北抗日。陈铭枢一面向军政部疏通，一面令王礼锡草拟对外通电稿。蔡廷锴将此事直接报告了蒋介石，结果蒋批示：“其勇可嘉，其事必败，千万不可行！”^[26]不久，上海局势趋于紧张，十九路军不能不就地备战，北上抗日之事遂中止。

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日本人在三友实业社挑衅，并纵火焚毁工厂。日本人四出寻衅闹事，日军大举增兵上海。日方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中方道歉、惩凶、赔偿及取缔抗日运动等无理条件，上海形势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上海形势紧张之际，正是国民党内政局变化、风云诡谲之时。据陈铭枢的机要参谋回忆，陈起初尚未及重视日本动向，而是忙于政海角逐，“有些踌躇满志之态，卫戍公署职务，一切委诸参谋长邓世增”。^[27]蔡廷锴月初来南京会商公务，想找陈铭枢研究一下形势而未能如愿。到中旬以后，蒋、汪合作之势已成，陈铭枢有受冷落之感，他才回过头来关注自己的基本力量十九路军的处境。大约在2月中旬，蔡廷锴找到陈铭枢，谈到上海时局，陈对蔡说：“看日本的风头大势，或许要在我们防区制造事变，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不得已时，打就打，最大打光为止。但是憬然（蒋光鼐）还在莫干山疗养，要通知他赶快回来，大家同舟共济才行。”^[28]蔡廷锴回忆，他曾问陈：“万一敌人向我侵犯，我军取如何动作？”陈答：“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29]虽然当时陈铭枢在军事职务上对十九路军已经没有指挥关系，但是，当时的中国军队传统，仍然是重视基于历史渊源而来的个人和小团体的服从精神。陈铭枢是十九路军事实上的领袖，他的态度对十九路军的动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了陈的上述指示，十九路军开始进入战备状态。

1月23日，十九路军在上海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一旦战事发生时的应战计划。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以及驻沪七十八师

干部参加了会议。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处长樊宗迟也奉陈铭枢的命令参加会议，他转达了陈的几点指示：(1)吴市长（铁城）已回沪，关于交涉方面事，请与吴市长商量；(2)军事方面由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计划；(3)日寇零星少数的来，不必理他，多数或大部队来犯，我须出于正当防卫时，才抵抗。^[30]据陈铭枢回忆，此项指示第三点为“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31]无论字句如何，陈铭枢指示的精神是明确的，即当遭遇日军进攻时，必须抵抗。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也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议：(1)决心死守上海；(2)七十八师就原地死守，六十师调南翔为预备队；(3)指挥部设真茹。会议还讨论决定了装备、粮秣及作战方式等问题。会后，十九路军下发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32]密令包括了一系列具体作战部署。

十九路军召开作战会议的当天，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四人联名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全体官兵进行政治动员。《告同志书》说：“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伟大屈辱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生，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看清楚此次与仇目拚命，迥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滴血，即挽回一份国运。”

“我们为紧急应付起见，只有以我们的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页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尽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

龙华会议的次日，蔡廷锴又在苏州召集七十八师与六十师的将领开会，传达准备作战的决定，得到与会军官的一致拥护。蔡下令各师班长以上人员分批轮流秘密赴沪侦察地形，蔡自己也带了参谋处数人前往各处巡视，尤其察看了吴淞口及狮子林炮台的部署，还进行了详细的图上作业。可以说，十九路军作为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为未来的战事已作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这并不是在中国统帅部统一计划下的准备工作，而仅仅是一支作战部队单独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对于对日作战来说，当然是非常不够的。1月26日下午，蒋光鼐致电陈铭枢汇报准备情况，表示布置已妥，随时可尽军人天职。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备战活动，不仅报告了陈铭枢，也报告了南京中央政府。龙华会议当天，蔡廷锴与戴戟即联名致电孙科、何应钦等人，表示：“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34]但当时国民党内部以主张对日慎重者居多，他们没有在上海对日本武力抵抗的心理与物质准备。蒋介石、汪精卫携手合作之后，均主张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采取和缓态度。据此，上海市政府接受了日方的四项要求。日方又节外生枝，无理要求十九路军退出闸北。南京军政部为避免冲突，下令十

九路军后撤南翔、真茹一线，将闸北防务交给宪兵第六团担任。但让步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28日晚，就在十九路军准备移防、宪兵六团准备接防之际，日军向闸北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拉开了大幕。

四、运筹帷幄

1932年1月28日深夜，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到日军向我进攻的报告，立即从龙华总部步行到达真茹前线指挥部，依原定计划指挥战事。他们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据陈铭枢回忆，何的回电对蒋、蔡、戴有所责难，使他们感到压力沉重，3人一言不发。恰在此时，陈的回电到达，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光荣的传统，并表示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陈的回电大大鼓舞了蒋、蔡、戴的抵抗意志，他们遂下令前线将士坚决抵抗。当夜，日军以优势火力进攻，并放火助势，极为凶猛。但久经沙场、战斗经验丰富的十九路军官兵，沉着冷静，奋力抵抗，将其击退，至天明时，日步兵已不敢再进。

上海战斗打响之后，十九路军于29日发出通电，严正宣告：“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35]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地位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国民党的统治，因此，国民党处理上海问题与处理东北问题显然是有差别的。国民党对上海抗战作出了一定的积极姿态，不愿意轻易地屈服于日本的军事压力。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声明：“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36]当天，国民政府决定，除军政、外交两部之外的政府各部会机关，暂迁洛阳办公；设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陈铭枢等为委员，以适应对日作战的变化。在党政大员北上洛阳之后，留在南京的负责人只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以及陈铭枢3人，其中何应钦负责军务，罗文干负责对外交涉，陈铭枢以交通部长的身份留下来，显然是因为他与十九路军的渊源，而和当前的抗战发生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中央也曾于2月8日、2月23日致电前线将士，予以鼓励。

陈铭枢在整个“一·二八”抗战期间，由于他的军政地位已被削弱，只能在国民党中枢以自己的影响力，尽力支持前线的战斗。陈铭枢对这次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示军机，指导十九路军的作战；二是激励官兵士气，鼓舞官兵斗志；三是坚决反对妥协议和，为十九路军呼吁支援。他为这次英勇的抗战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战后编写的有关战史，称陈铭枢“在事实上本为十九路军的最高领袖，当战争未爆发以前，原为主战最力的人，及战事爆发以后，又闻知我军大胜，其欢狂态度，坚确决心，比任何人都要热烈。”^[30]这并不是过份的夸张，更不是反右期间所指责的冒功，而是历史的事实。至于军队的私人服从关系，是当时中国军队的一种历史积习，对这场抗战来说，无须深究。

上海作战的前线指挥是蒋光鼐与蔡廷锴，尤其是蔡廷锴，深入前线，指挥战斗，灵活应变，战功卓著。在前后历时1个多月的作战期间，蒋、蔡与陈铭枢之间保持了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几乎逐日有电报给陈，或汇报战情，或请示方略。通过这种联系，陈铭枢得

以对前方随时指示机宜。在作战方略上，陈铭枢的设想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消灭日军。战斗刚打响，他就指示十九路军对“租界外日军应相机消灭之”。当时日军主要是原驻上海的一些部队，我军尚保持一定优势，做到这一点还是有可能的。但日军每遇形势不利时即退往租界，使我奈何不得。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曾向陈铭枢建议，在日军向我进攻时，我应集结大量兵力于适当位置，当敌退却时，我应跟踪追击，投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之，并乘胜占领苏州河北租界区。陈铭枢因顾虑外交关系重大而复杂，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并一直要求十九路军不要将战事扩大到租界，以致“事后想起来，后悔不及”。战事后期，日本调动陆军师团增援上海前线日军，我军歼灭日军的可能性已经失去，相反面临日军增援的沉重压力。陈铭枢自始即考虑到达一点，指示蒋光鼐与蔡廷锴：“在敌增援之陆军未到以前，须预想定其登陆地点，到时力阻其登陆，如敌增援陆军之数量，探明超过我军时，候令进止。”^[38]以后战局的发展，与陈的指示是相吻合的。

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训练出来的一支劲旅，陈与该部官兵的关系非一般上下级关系可比。自沪战爆发后，陈铭枢时刻关注战况的发展，激励官兵的作战精神与士气。1月30日，陈向前方将领通报了国民政府中央的有关决定，告诉他们“枢亦密留，拟明日先到镇江，再随军前进，与兄等共生死。国家存亡，本军荣辱，系于此举。望更激励将士，不负初心，为全国军民之钦式也。”^[39]其后，陈铭枢密赴前线劳军，并与诸将领会商战局。事后，他向报界发表了公开谈话，表明“前两日入军会晤各将士，有使余生极大之感动者”，并表示了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也是他本人的决心：“该军不论遇如何侵犯我国土之强敌，决不畏惧，虽全数牺牲，亦决不离开京沪线上。”陈铭枢的态度大大鼓舞了官兵的斗志。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以及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支持下，十九路军官兵人人怀必死之心，奋勇作战。日军虽一再向我进攻，在狭窄的战场上，除飞机投掷炸弹以外，还用大炮轰击，但在我军竭尽全力搏击下，终不能得逞。开战半月之后，我军防线变动不大，日军进展甚微。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作战虽然给了日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但与日军比较，十九路军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日军装备优良，火力占优，增援兵力也源源而至。十九路军全军只有3个师2万余人，战前1个师驻南京、镇江地区，1个师驻苏州、常州地区，只有1个师驻上海。开战后3个师虽全部开到上海，但兵力、装备与不断增兵的日军比较，越来越相形见绌。为此，陈铭枢在沪战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十九路军请求增援，并与对日妥协的主和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沪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摆出抗战姿态。蒋介石也通电全国，要求“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40]但国民党此时尚无全面抗战的决心与准备，因此解决事件的总方针是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重点又放在交涉上。在南京主持军务的何应钦是这个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他与力主以抵抗为主的陈铭枢之间不断发生着矛盾冲突。

在沪战未打响以前，何应钦即要求十九路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沪战打响之后，何应钦一直主张对日持慎重态度，反对扩大事端。他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电报中，告诫他们“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请他们“酌量情形”，接受英美调停。他还要蒋、蔡“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41]这样束缚我军手脚的指示，自然引起前方将领的不满。但何应钦坚持己见，多次指责十九路军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打乱了中央部署，把事情弄坏了，进而又责怪陈铭枢不知道约束部属，增加政府困难，连政府的政令也不顾了。陈铭枢愤愤地告诉蒋光鼐与蔡廷锴有关情形，示意他们：“吾侪只有认定为民族光荣，而完成本军之使命耳。”

陈铭枢与何应钦之间关于淞沪抗战的分歧，一是要不要打下去，二是如何打下去。2月6日，汪精卫、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等到浦镇与何应钦、陈铭枢“晤商一切”。其后，何、陈两人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陈铭枢给十九路军连去两电，要求“我军须死守，不轻让寸土”，“鄙见迟早总须决战，愈迟于我愈不利，兄等当机立断可也。”^[42]何应钦则在给吴铁城、宋子文、张群、孔祥熙等的电报中，大谈“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纾缓迁延，牺牲我十九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抑且失地，……不能不考量情形，权衡轻重，适可而止也。”^[43]何应钦此电颇含深意，他想利用军事长官一般都愿意保存实力的想法，打着为十九路军着想的旗号，诱使十九路军放弃抵抗。陈铭枢洞察何应钦的用意，为了坚定前方将士的抵抗决心，特意给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及各师、旅长去电，重申“本军为着精神、道德、正义、公理、光荣、自由而抵抗暴日，其价值是绝对的永久的，吾侪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初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针对何应钦的言论，陈铭枢谈到“近日颇有人发议，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故略申前意，以勖兄等，愿共勉之。”^[44]

既然何应钦反对打下去，他更不会在如何打的问题上操心。陈铭枢知道前方的实际情况，认为十九路军兵力薄弱，军械缺乏，主张大力支援，但遭到何应钦的反对。当陈铭枢提出将江北的胡宗南、梁冠英部调至江南增援时，何应钦生怕开罪日方而反对。他的理由是，日方已提出警告，如果我军渡江，就要开炮射击，因此不能草率行事。陈铭枢则认为，日方害怕的就是战区扩大，兵力不敷，未必会向我渡江部队寻衅。如果日方寻衅，对我正为有利，我更可以充分理由对日作战。但陈的主张得不到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支持，何应钦更加有恃无恐。为了抵抗与增援的事，陈铭枢与何应钦屡屡争执不下。何多次对陈说，仗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陈回答，前方的官兵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打吗？何又说，什么老百姓？陈说，开战以来，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财产，难道我们就这样罢了不成。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气氛激烈，有时在电话上争得性起，连听筒都摔掉了。

其实，沪战爆发后，中日双方间的接触一直在进行。上海市政府、十九路军以及何应钦派出的代表陈仪、王俊都各秉南京旨意，与日方有过交涉。无奈日方坚持既定目标，要

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区，如此要价使双方不可能谈到一起去。陈铭枢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谈和“诚属徒然”，何况，“不抗则无外交可谈，而一抗之后，其影响所及，必更获极大之价值也。”因此，即使在同意与日方交涉时，陈铭枢对十九路军指示的着重点仍然放在武力抵抗上。

2月12日，何应钦、陈铭枢与罗文干讨论了中日停战交涉问题，决定以下列条件作为交涉基础，即中日军队各自后撤，双方之间的地区可由中立国派兵暂驻，行政、警察仍由中方办理。对这个决定，何应钦与陈铭枢再次表示了不同态度。何要蒋光鼐、蔡廷锴“即照所定办法，与日切实商洽，结果随时见告”，并严令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陈铭枢在向蒋、蔡通报此事时，要他们在交涉同时不忘作战准备，“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任何当局所摇夺为要。”^[45]

淞沪抗战初期，蒋介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他对前线作战频有指示，要求通盘筹划，“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并对蒋光鼐等表示，“如有必要，中可亲来指挥也”。当时驻沪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官兵纷纷请战，在遭到何应钦斥责之时，却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他指示何应钦，将该两师编为第五军，由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前线，以十九路军名义参加抗战。八十七师与八十八师原为国民政府警卫师，全副德式装备，他们开到上海，为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在淞沪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作出一定的抵抗姿态，既有迫于内外压力的因素，也有拉拢人心、稳固地位的需要。然而，蒋介石解决上海战事的重心还是在“交涉”而非“抵抗”。他担心因为沪战而影响既定“剿共”计划，因此反对扩大事端，决定“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果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46]何应钦的“适可而止”主张实际也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自从派出了第五军以后，蒋介石便没有在抵抗一事上再进一步。2月中旬他从洛阳回到南京后，陈铭枢与何应钦之间关于沪战的冲突便为与蒋介石的冲突所取代，蒋、陈关系因此而更加恶化。

2月13日，蒋介石在浦镇召集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会商上海战事。蒋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条件是：1、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停战；2、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撤退至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蒋还说：“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47]所谓“攻势防御”，是以攻势为手段，达到防御的目的，因此，不包含积极进攻、驱逐日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的意旨，除电知十九路军将领外，他还让陈铭枢单独电示蒋光鼐，转达他的意图：“政府对外态度与民众口气，轻重缓急，其作用不同，兄等须谨慎从事，依照政府指导而行，外间不负责之议论可不理会也。”^[48]陈铭枢对蒋的这种态度甚为不满，因此特意在电文后加上“以上系总司令面嘱电达”一句话，以示那是蒋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同时也向前线将领表明他在中枢的困难处境。

蒋介石、何应钦的态度，对前方将领的心理当然会发生严重的影响。实际带兵作战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虽力主抵抗，企望“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作战双方的实际情况，不能不考虑国民党中枢缺乏战斗决心这一重大政治因素，因而对十九路军孤军作战的局面忧心忡忡。作为直接带兵的部队长，不能不考虑部队的当前处境和命运，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他们与陈铭枢之间不免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差别。2月16日，蒋光鼐在给陈铭枢的电报中，请求陈向蒋介石、何应钦要求，“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陈铭枢接到这封电报后，深感忧虑。他认为日本对谈判绝无诚意，大战难免。他也知道前方我军兵力薄弱，如照目前形势打下去，确实难操胜券。为此，他除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增援外，还主张扩大战区，令东北全军反攻，令沿海、沿江各省埠一致抗日，使日本首尾难顾，以全面持久的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十九路军在上海尽可能长久的坚持下去，以带动、激励全国的抗日浪潮。因此，陈铭枢对上海抗战的考虑，更多地从长远的国家政治和民族利益出发，这与他一贯的做法以及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陈铭枢在接到蒋光鼐的电报后，立即回了一封长电，说明自己的态度。这封电报是陈在沪战期间有代表性的文电之一，从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为此节引如下：

今日岂有和之可言，惟有降服。降服，敌人亦不能放我，又岂有战之可言。绝交宣战之形式，既不适用，可适用者，只有处处与之抵抗到底而已。……吾人倘只斤斤为爱十九路军之计，恐本军之命运，在精神与实际，终陷于爱惜不了之局势，即整个党与国任何部队，恐亦将如此！弟早屡促军政当局，下大决心，抽调各方援军至前线，并极力设法推动东北，能否照办姑勿计。惟上海战争，必须在原线抵抗，或终必难有撑持，即失败后，化整为零，作类似土匪式不规则之战。最后之结果，积极仍可利便外交之解决，消极亦可见民族之精神。十九路军虽毁灭，全国犹将有千百十九路军前仆后继，犹是十九路军之成功也。望兄等勿再忧虑。^[49]

从此电可知，陈铭枢是抱着宁愿毁灭十九路军的决心，激励所部坚持上海抗战，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浪潮。在抗日的问题上，陈铭枢与蒋光鼐、蔡廷锴是一致的。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他们因为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会有一些差别。蒋、蔡更关心军事作战与部队处境，陈则多考虑政治与大局，从中也可见陈铭枢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远大政治眼光。蒋、蔡尊重陈的意见和政治指导，接陈电后，蒋即复电称“职等亦作如此打算”。陈铭枢坚定的抗战立场，大大鼓舞和坚定了十九路军将士的战斗决心。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陈铭枢在后方为十九路军摇旗呐喊，蒋光鼐、蔡廷锴在前方指挥作战，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淞沪抗战得以坚持的重要因素之一。2月中旬，日军因等待陆军主力部队开抵上海前线，曾有数日处于休战状态。这时我第五军也全部到达上海，归十九路军统一指挥，使我军实力得到增强。双方都在调整战线，作大战的准备。18日，陈铭枢前来上海，住在自己的家里，和各方面有所接洽。当时，中国政府方面极不重视对战事的宣传，外国记者所接收的多是日本方面的消息。陈铭枢的幕僚黄强在这一天介绍了一位法国记者来访，陈回答了记者提出

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抗战的性质，作了坚定的阐述：

“请问这次战争的意义？”记者。

“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意义很简单：反侵略战！”

“中国方面，能够有必胜的把握吗？”

“我们只知道谁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谁。至于胜败，我们始终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50]

日本陆军第九师到达上海后，日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于18日蛮横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20日下午7时前，从现据之线后撤20公里，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通牒遭到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一致拒绝，蔡廷锴在复文中严正声明：“本军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统辖之军队，所有一切行动，悉遵国民政府之命令。”十九路军还在公开通电中表示：“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51]

日军以武力威胁我后退的企图失败后，淞沪前线爆发了开战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从20日开始，日军全线攻击吴淞、江湾与闸北。“我方全线军士，奋勇抵抗，毫不退让，敌军虽用全力攻击竟日，结果终被我军击退，我方阵线仍旧毫不变动。”22日，日军集结重兵，在猛烈炮火掩护下，重点攻击庙行，血战终日，双方短兵相接，混战肉搏。第五军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张治中亲临前线指挥堵截，蒋光鼐当机立断，果断地命令十九路军实施反突击，终于收复阵地，重创日军，毙敌上千，取得了淞沪抗战以来最重大的战果，我军声威大振。

庙行之役后，前线又有几日平静。日方继续增兵，而我军连日作战，后援不至，部队疲惫不堪，缺乏人力物力补充，形势很不乐观。陈铭枢对此极为担心，于22日亲赴南翔总部，与十九路军将领会商战局。大家都认为，如果后撤，将拉长战线，影响士气，更难坚持，因此主张“死守原线待援”。会后，陈铭枢、蒋光鼐分头向蒋介石、何应钦请求增援。陈铭枢向蒋介石汇报了前方情况以及会议的决定，要求蒋按照以前允诺的，将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调至二线赶做工事，并速调江西的陈诚、卫立煌、谭道源各部前来上海。他向蒋表示，如有部队增援，十九路军再坚持下去没有问题，而且，只要达到抗战目的，前线部队牺牲在所不惜。蒋光鼐也向何应钦要求“速派有力部队增援，以免孤军久战”。但结果还是使他们失望。蒋介石在给陈铭枢的复电中，强调上官云相部渡江困难，而陈诚等都路途遥远，请陈不必等待援兵，而照计划进行。陈派去面见蒋请援的参谋长邓世增空手而归，他告诉陈，援兵无望，请他“查察情形，妥为处置”。上官云相部过江后，只有一个团到达二线修筑工事，其余三个团均滞留后方不动。据邓世增说：“现在一兵一卒到前线支援，须得蒋先生命令才能开动。”陈铭枢对蒋的如此做法非常气愤。据他的机要参谋回忆，“陈当时气尚悻悻，似与蒋当面闹翻，不愿会面。”^[52]

在向蒋介石请援无望的情况下，陈铭枢仍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运用个人影响，多方想办法打开局面。他绕过蒋介石，要浙江的戴岳独立旅赴沪，并请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支持。

戴旅在到达杭州后，因鲁涤平的反对而停止前进。陈铭枢又想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当时孙科等留沪中委态度激昂，曾有电给蒋，要求“决定彻底抵抗政策”，“予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陈铭枢即给孙科去电，请他“邀同各中委迅诣洛阳，巩固中央，主持大计”。陈铭枢又给汪精卫去电，认为如能坚持抗战，其利甚大，但“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枢默念熟思，方今对内对外，惟有集合全党之意志，树立统一巩固之中央，提挈全国一致所趋之民众，以与暴日周旋，此外一切人事，臧否利害，均当暂置。兹值粤已听命，各中委齐集行都，尤为难得之机，虽权为不称，亦旋转之一大关头也。”^[53]这是明显地想利用蒋、汪矛盾，请汪主持抗战以制蒋。但是，孙科也罢，汪精卫也罢，都只想投机取巧。孙科口头强硬，但口惠而实不至，滞留上海无所作为。汪精卫则满足于刚刚谋到的行政院长宝座，位子还没坐热，哪里肯再冒与蒋介石翻脸的风险。

淞沪抗战打了一个多月，陈铭枢也为十九路军奔走呼号了一个多月。他不避嫌疑，不顾劳累，为的就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计。然而，除了十九路军听从他的指示，在前线坚守阵地之外，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努力所得不多。毕竟独木难支，在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之后，陈铭枢心力交瘁，卧病于床。但他仍指示十九路军抵抗到底：“（作战部署）须看日军增加兵力如何，再定计划。惟盼兄与诸同胞尽力之所能及，以抗强敌而已！”他在给洛阳段锡朋的电报中，悲愤地谈及自己的心情：“外侮非足亡国也，亡国者，自侮耳！心之忧矣！聊贡区区，愿毋河汉。”^[54]

陈铭枢求援不得，日军则增兵不断。蒋介石在后方不顾前线兵力单薄，空言指示作战机宜，要十九路军及第五军保持半数以上的预备队，对侧后浏河方面应准备有力部队监视。蒋光鼐当然知道前线部队缺乏翼侧掩护的危险，无奈兵力单薄，捉襟见肘。他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抱怨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蒋介石的亲信、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每日有电向蒋汇报战况，他对前线战况与蒋光鼐有同感，对战局发展满怀忧虑。至关重要的侧后浏河方向，属第五军防线，但因实在派不出部队，只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个营负责监视。2月27日，蒋光鼐鉴于部队处境危险，曾有意将部队撤至二线，以收缩防线，作持久战的准备，但因十九路军各官长都愿死守原有防地，不愿撤退，于是，仍决定固守全线不动。

日军在得到国内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在正面发动全线总攻。同时，日军以重兵在我军侧后浏河口一带登陆。因为我军防线空虚，日军登陆后得以不断扩大阵地。张治中急调部队堵截，与日军作殊死战斗。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我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蒋光鼐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于当晚全线后撤至二线阵地，继续抵抗。他在给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说：“援绝兵尽，无法应付，全线动摇，职乃决心于11时开始全线撤退。”^[55]在敌军重兵压迫之下，蔡廷锴亲至前线，巧妙地指挥部队，脱离战线，安全后撤。吴淞炮台翁照垣部则死守至3日方撤。我军撤退后，日军因为达到了预定目标，也不再追击，双方

对峙，中止了战斗。历时一个多月、震惊国内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告一段落。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治中等于3月2日联名发出通电：“惟愿我全国父老兄弟，毋忘闸北、江湾，全国军事领袖毋忘朝鲜及今日之东省……我十九路军、第五军，亦惟有收拾余烬，背城借一，事之不济，则拚命于沙场，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也。”^[56]

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五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以及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包括无数的无名英雄，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作出的英雄业绩，永垂史册，陈铭枢为发动、组织、指挥“一·二八”抗战，付出了无数辛劳，他作为抗战的中坚人物，同样功不可没。1957年反右期间，所谓陈铭枢阻挠淞沪抗战的种种不实之词，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五、“拆台”倒蒋

我军撤退之后，上海前线形势渐趋平静，虽然中日双方军队之间不时还有一些小冲突发生，但双方角力的中心已经从战场转向谈判桌。3月14日，第一次非正式停战会议开始。24日，中日停战会议在英、美调停下正式举行。外交本非陈铭枢之所长，加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他已不能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不过由于他和十九路军的关系，陈铭枢仍然参与了一些淞沪抗战善后事宜的处理。

淞沪停战谈判，中日双方除外交代表之外，还各派出军事代表参加。中方派出的是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戴戟是主张抵抗的，不愿参加谈判，蒋介石只好请陈铭枢代为疏通，戴才勉强答应。黄强原为陈铭枢的幕僚，此时临时给以参谋长名义，参加谈判。通过戴戟和黄强，陈铭枢按理应该能够了解到谈判的内幕情况，但从现有资料中，没有找到陈铭枢对谈判有什么看法或指示。也许他对这种事插不进去，也许他无意及此。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4月1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京汤山俱乐部召集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等人，商议过谈判中我方最低限度让步的对策。中日停战谈判在撤军程序与双方军队驻扎地点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一度到了破裂的边缘。在5月5日中日签订的停战协定中，规定中国军队留驻现地，日军撤至公共租界即虹口方面越界筑路地段。中日军队之间地区由中国警察管理，成立多国代表组成的共同委员会处理有关事宜。至此，中日双方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停战程序。

淞沪停战之后，陈铭枢偕汪精卫、朱培德、李济深等，于3月15日与4月23日两次前往昆山前线劳军。据上海《申报》6月1日报道：5月28日，在苏州五卅公园隆重举行了淞沪抗日将士追悼大会，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均亲临致祭，“以哀悼我为国家争生存、为民族增荣光，而抛头颅、洒热血之抗日诸将士者”。当天参加追悼会的第五军官兵，衣黄呢制服，整齐严肃而躯干彪伟，精神饱满。十九路军将士则穿青灰布制服，短裤露膝，背系光荣无上而受外人崇拜的十九路军战笠，身材虽较短小，而勇健活泼。舆论认为，他们体现了“我中华民族之国魂”。淞沪抗战中最先接战的一五六旅团长张君嵩的一幅挽联，可以说代表了全体与会者对抗日烈士的敬意：“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

气吞倭寇，神勇远震全世界！为正义牺牲，为和平奋斗，血溅沪野，忠魂长绕大江南！”

由于在淞沪抗战期间，陈铭枢和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当局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陈铭枢的政治生涯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其实，在“一·二八”抗战爆发时，除了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外，陈铭枢并无军界的正式职务。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司令长官的职务，已在1月6日由国民政府任命蒋光鼐担任，蒋未到任前由邓世增代理。陈铭枢原来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职务，也在1月29日卸去，他还剩下的一个正式职务是交通部部长。对于陈铭枢担任过交通部部长职务一事，社会上一般人很少注意到，但在这时，这一职务上的矛盾却被人为地突出起来。

陈铭枢是1月4日到交通部任职视事的。在对部员的训话中，他表示今后对交通事业，将采紧缩政策，希望他们照常工作。此后他忙于淞沪抗战的有关事宜，对交通部的业务很少过问，一切委托政务次长陈孚木处理。淞沪停战之后，陈铭枢也没有多管部里的事，虽然陈铭枢在广东省政府主席任内，在发展交通事业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在这政治风浪激烈的时候，要他去过问交通、邮电一类具体业务，也实在是难为他了。在陈铭枢任交通部长期间，邮资加价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也没见陈有过什么处置。4月下旬，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自5月1日起全国邮资加价，结果引起立法院、邮务工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以及舆论的一致反对，上海邮工于5月22日罢工，引发北平、天津、济南、郑州、青岛等地支持罢工风潮。陈铭枢于23日以部长身份致电中央政治会议，请示处理办法，要求在必要时“执行严厉处置”。最后在各方调停下，才平息了风潮。

陈铭枢大半年交通部长生涯，他自己也觉得无甚可提。使他这段经历没有完全被人淡忘，则是由于当时发生的一桩轰动全国的贪污案。交通部下辖的轮船招商局，原系李鸿章委派盛宣怀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这时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当了挂名的董事长。李虽出身名门，但家道已经中落，自己又是个纨绔子弟，虽穷困潦倒，还放不下世家的架子。陈铭枢的老朋友黄居素见有机可乘，便玩起了手腕。他为李国杰策划，要他先谋得招商局的实职，再作打算。黄要李国杰先找李少川，请李少川向陈铭枢说项。李少川是李鸿章的旁支后辈，陈铭枢当年反袁失败后在上海躲避时与他结为生死之交。经李少川推荐，陈铭枢又考虑到李鸿章与招商局的历史渊源，便同意任命李国杰为招商局总经理。3月24日，李国杰走马上任。他与招商局监督陈孚木及黄居素谋划，对外宣传招商局缺船、少财、无人，债务不清，亏空巨大，拟借款整顿。李国杰以招商局码头货栈作抵押，向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借款1000万两。他们从中得到好处费80万两，黄居素曾提出给陈铭枢40万两，陈孚木20万两，其余20万两打点有关方面。实际分配时，却是陈孚木得20万两，其余均为黄居素卷走，随后两人即远走高飞到了香港。^[57]

11月8日，行政院决议将招商局收归国营。13日，上海市政府奉宋子文手谕，将李国杰扣押查办。15日，招商局改组，刘鸿生出任总经理，次日公布了李国杰违法秘密签订的押款契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纷纷要求追究责任。在香港的陈孚木拒不入京，并称

招商局已陷绝境，非抵押不足以挽危机，且已经批准备案。李国杰亦辩称，此事经陈铭枢批准，陈孚木签字。实际上，陈铭枢根本不知情，分赃一事，更是子虚乌有。他早在6月已辞职不问部事，10月间出国。不仅陈的友人证明陈未闻此事，接陈任交通部长的朱家骅也否认了李国杰的说法。陈铭枢是在次年初于法国得知此事的，他为自己无端受累而生气。他一面给陈孚木去电，要他回去说清楚，好汉做事好汉当；一面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明情况，表示如自己有染，愿受严惩。李国杰于12月27日被判3年徒刑，陈孚木则始终拒不投案，最终此事不了了之。陈铭枢虽与此事毫无干系，但毕竟使不知底里的人以为，这是他出国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福建事变发生后，则更以此做文章来诋毁陈铭枢，致使外间对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以往的传言应该随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了。

陈铭枢本人，虽然自淞沪停战之后，得以从极度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松弛下来，但是，他对政局的判断思考和政治活动并没有随局势的缓和而松弛。而且，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自蒋在中山陵谈话要求结拜金兰，遭到陈的拒绝后，已经起了变化。在陈铭枢一方面，觉得蒋用心深远，不可不防，而邓演达遇害，更使他警觉，成为他“不计后果坚决反蒋的里程碑”。淞沪一战，政见冲突，泾渭分明，使陈认识了蒋的真面目，从此，他从已往拥蒋的立场转为坚定的反蒋。在蒋介石一方面，中山陵谈话后，蒋已觉察陈并不能让自己随意指挥，邓演达案发生后，蒋可能也发现了陈和邓联系的蛛丝马迹。淞沪之役，陈铭枢坚决抗战的立场和十九路军的战绩，使陈声望大涨。所谓“怀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何况，陈不愿服从蒋的战略意图，更为蒋所不容。蒋对陈已从利用拉拢转为打击排挤。当时有蒋、汪、胡、孙、陈五巨头之说，胡汉民远在广东，孙科从来没有自己的定见，汪精卫则已与蒋合流，且汪、胡、孙三人均非军人出身，手中也无军队，惟有陈铭枢系军人出身，有一支精兵供驱策，有一个小小的派系围绕其周围。陈铭枢既有力量又有识见，时有举足轻重之行动，因此蒋、陈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很难避免了。

蒋介石要打击陈铭枢，就首先从对付陈铭枢实力的源泉十九路军着手。在蒋介石眼里，十九路军自成一系，只知有自己的传统而不知有黄埔，只知有陈铭枢而不知有蒋介石，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最大威胁。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决定了抗战的方针，逸出了蒋介石的政治控制和指挥系统，由此给国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带来的一连串冲击，尤其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忍。因此，蒋介石在战后，立即就提出将十九路军调离京沪核心地区的问题。十九路军在京沪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易受攻击，蒋光鼐、蔡廷锴也不很满意，对调离并未反对。但蒋介石要将十九路军三个师分别调往湖北、安徽、江西，名为倚重，实则分割，遭到十九路军的坚决反对。最后决定，十九路军全军调往福建。蒋介石想让十九路军在“剿共”战斗中消耗削弱，十九路军则认为福建毗邻广东，进退自如，双方达成了妥协。6月1日，国民政府特任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十九路军开始分途入

闽；28日又明令裁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

十九路军调离京沪一线，陈铭枢是同意的，这虽然使他在中枢的政治斗争中，缺少了一个直接有力的支撑，但也可使十九路军摆脱蒋介石系优势兵力的挟制。他仍可凭借十九路军的力量进行反蒋活动。据翁照垣说：曾有人向陈建议，乘南京形势空虚，陈身兼数职，十九路军又在京、沪之机，在南京发动政变，可操纵自如。^[58]但陈铭枢知道这样做风险太大，没有采纳，而只是从政治入手倒蒋，主要是利用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矛盾，进行“拆台”运动，要他们不和蒋合作，迫使蒋垮台。陈铭枢首先联络了冯玉祥、李济深等已经失去了军权而仍有影响的军界领袖，又联络了胡汉民、孙科等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粤系政治领袖，同时，还联络了党内的一些元老派要人，要大家通过合法途径，限制蒋的权力。对此，基于同蒋长期形成的矛盾，这些人自然都表示赞成。胡汉民骂改组后的政府朝三暮四，于国于党，何补何益。孙科则提出抗日救国纲领，主张速行宪政，开放党禁，全国一致抗日。但这些人当时都已没有实权在手，难以有所动作。为此，对当时掌握政治实权的人物，陈铭枢着重做了两个人的工作，一个是行政院长汪精卫，一个是副院长宋子文。陈铭枢找到汪精卫，对他说：“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绝不会相信你。我们必须拆他的台，另开局面。你还是回南方去，与胡展堂（汉民）先生合作为好。”^[59]汪仅对陈虚与委蛇，并没有听从陈的谋划。实际上，他对行政院长的职务，十分满意，恋栈固位尚恐不及，自不会跟陈走。后来，陈铭枢估计，汪精卫还把他的话向蒋介石告了密，使蒋得以从容布置，威胁利诱，破坏了他的计划。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施政措施表示不满，曾对陈铭枢表示过不满情绪。陈对宋说，蒋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我们就拆他的台，大家辞职，不替他撑门面，他就会垮台。宋表示同意。结果宋子文成了响应陈铭枢“拆台”运动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部长。

6月4日，宋子文提出辞职，陈述的理由是：“军政支出将有增无减”，“大势惟有举债，然挖肉补疮，终将至肉无可挖”。当天，陈铭枢也发出了致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的辞职书，书称：“铭枢迩来益觉身心了无把握处……与其进而招尤，毋宁退而获咎。为改过自新再策后效之机，当亦长者君子之所宽许也。”次日，陈铭枢发出公开辞职通电，电称：“责任日重，心力日绌，捉襟见肘，动致愆尤，耿耿孤怀，悠悠人口，每彷徨于中夜，终无补于艰难。长此扰营，大之贻误邦国，小之害及身心，计惟辞谢一切公职，屏绝人事，痛自循省，以惩其过去，勤勉学问，以励其将来，报国之日方长，求去之心遂决。”^[60]

宋子文、陈铭枢同时辞职，确实震动朝野。蒋介石与汪精卫会商，决定予以挽留。蒋致电宋、陈，“劝以国家大局与中枢基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万勿遽萌高蹈之志。”6月8日，汪精卫、顾孟余、邵元冲、叶楚傖、黄绍竑、褚民谊等一千人等到达上海，对宋、陈“恳切挽留，且拟进一步商得办法，使时局有进展可能”。汪表示他与蒋对宋、陈均“十分同情”，陈辞职是因“在环境上亦有不得已之困难，吾人亦应设法排除”。汪等与陈铭枢长谈近2小时，陈“详述不得不辞职之苦衷，态度仍极坚决”。^[61]其实，蒋、汪挽留重心

在宋而不在陈，宋则因为与蒋的关系不会如陈之坚决。果然，汪精卫回南京后，在院会上称宋已打消辞意，对陈则顺水推舟，称他因病请假须略事休养。蒋、汪联手，破坏了陈的计划，此后再没有一个阁员响应辞职。7月1日，行政院决议，对陈铭枢给假3个月休养，由黄绍竑代理交通部长。陈铭枢发动的“拆台”运动，终告失败。

六、卸职出国

陈铭枢发动的“拆台”运动的失败，表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暂时还无人可以动摇，蒋已渡过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危机，重新稳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内部也暂时建立了新的平衡。于是，陈铭枢只好在上海闭门谢客，表面似乎不再过问政事，显得意志消沉，对外宣称心耽禅悦（即修炼佛法），实际上则在考虑未来的计划。

这时，蒋介石利用陈铭枢在野的机会，力图削弱陈铭枢对十九路军的影响，企图将十九路军收为己用。他数次召见蔡廷锴，要他“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并向他询问两广陈济棠、李宗仁对中央的态度，暗示蔡应与陈铭枢以及两广军政界保持距离。蒋介石慨然表示，十九路军如有困难，中央将尽量设法解决，意图拉拢。蔡廷锴对蒋介石的用心很是反感，对十九路军在当前的政治处境极为不快。他认为：“此次抗战，系出于诚心，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当时我军亦非挑战，何以弄至政府不满？思之无不为国家民族前途悲也”。^[62]十九路军入闽后，蒋光鼐即赴东莞原籍休养。陈铭枢在上海分头派人去蒋、蔡处，征求意见，讨论下一步计划。8月底，陈又专招蔡到沪商量。蔡认为十九路军血战之后需要休整，需要从中央得到饷械补给，目前不宜有何动作。陈铭枢则提醒蔡廷锴：“各方对十九路军均有妒忌，请你留意”，也就是要防止十九路军被人分化、收买。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出路则表示：“汪某执政以来，鬼鬼祟祟，极峰（指蒋介石——引者）又不满，我不得不走。”蔡廷锴询问，自己是否也以辞职为好？陈铭枢表示：“十九路军乃民众国家武力，责任重大，何须灰心？还是做好。”对十九路军抱有很大希望。^[63]于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对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即陈先出国暂避，十九路军维持现状，在闽整顿，作未来行动的准备。

10月，陈铭枢请假3月期满，再次提出辞职请求。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陈的辞职请求，决定任命朱家骅为交通部长，28日，国民政府正式明令公布，扰攘政坛数月之久的陈铭枢辞职风波暂告一段落。时论曾对陈之辞职去国有一段分析，认为他在“一·二八”以前，“一以蒋为圭臬”，“一·二八”以后，对蒋之信仰，“渐行堕下”，此后仕途为蒋所阻，已成蒋之异己。陈因政见“既各有所格而不能伸，且亲信之间，亦时有不谅之举，兼善天下固有未能，独善其身亦时有烦恼，各事相来纠缠，在沪居住、游息之间，亦辄感不甚自由，去国情怀，于以益切，此点为陈氏浮海之主因。”^[64]这一评论，对陈铭枢的政治处境看得比较透彻。就陈铭枢的政治风格和个性来说，也是吻合的。解放后，他曾反省自己说，“在军时则讨厌军”，“在政时亦不安心岗位工作，疏阔无比”，也就是大度而又粗疏。因此，在他的个人历史上，每遇挫折，往往一走了之，而不计后果。

还在陈的辞职请求未得正式批准前，陈铭枢已于10月20日乘轮离沪南下，23日抵香港，次日即乘法轮科勃仁士号启程赴欧。船行一月，途经亚、欧多国，11月22日抵达法国南方港口城市马赛。途中，他曾应菲律宾华侨社团之邀，在马尼拉稍作停留。他感谢各界侨胞对十九路军抗战的支持，认为中国不能依赖他人，而应自力更生，谋求东北问题的解决。

陈铭枢在赴欧的一个月的航海旅途中，为华振中、朱伯康编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写了一篇序言，集中反映了他此时的思想认识。在这篇序言中，陈铭枢提出使中国走上光明前途所要完成的任务是：

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无论是解放民族资本，或走社会主义道路，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是唯一的前提。

二、中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在领导，但三民主义不是以它的静的内容在领导革命，它是逐渐前进去适应革命的需要。

三、中国在政治上要为民族利益而谋统一，为此可以牺牲主张上的成见或历史上的恩怨。

四、经济上要有统制的组织，以国家的统制有计划地来发展社会化的生产。

五、反帝运动需要动员全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保障大众的反帝政权。

陈铭枢的结论是：“以反帝国主义斗争为我们目前唯一的任务，组织并武装反帝民众作为斗争的主力，以统一的政权，统制的经济为我们斗争的准备与手段。”^[65]

在这篇序言里，陈铭枢明确了反帝是中国当时的首要任务，而反帝即是抗日的代名词。他又主张更新三民主义以适应时代需要，发动民众，扩大各阶层的反日大联合，争取各阶层、农工大众与知识分子对反帝抗日的支持。这些无疑都是合理的进步的主张，是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要求，实际上成为他后来发动福建事变的理论根据。

陈铭枢在辞职前后相对悠闲的生活中，得以静下心来读书，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北伐时期，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陈铭枢涉猎过一些唯物辩证法，但是以佛家的因明学比附辩证法，站在佛教立扬，力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此后，一方面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一方面陈在官场中沉浮，他的理论见解没有大的突破。直到“一·二八”前后，他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处处碰壁，感到政治前景令人失望，思想苦闷，才又想起回过头去读点书，借以分析形势，思考未来。加之他接手神州国光社后，接触了一些左翼文人，他们思想活跃，对陈的影响很大。也就在这期间，陈铭枢读了一些由日文转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虽然他并没有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仍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篇序言，集中地反映了陈铭枢理论上的修养和进步。

解放后，陈铭枢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说：“我是从小读线装书的人，深受儒家封建思想影响，在政治生活中又学会了纵横捭阖一套。继又学佛，习禅宗，但又热衷于政治，思想实极庞杂。”^[66]那么热衷于文化理论修养，这在当时国民党的职业军人中确不多见。虽

然陈铭枢当时的主张仍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套，但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在“一·二八”以后思想认识的变化，这是他转变为同情革命的爱国的民主派的重要时期。

陈铭枢在欧洲期间，先后走访了巴黎、柏林、伦敦等地，会晤了不少旧友新朋，其中包括王礼锡、欧阳予倩、罗长海、程希孟等人。他在思想认识上和他们有了许多可以沟通的共同点，在政治上更着重讨论了如何发动反蒋抗日的问题。他坦率地对朋友们说：“我同蒋介石已再也不能合作了，他的对内独裁、对外不抵抗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在国民党内反对他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地方势力和许多元老派在内。我在国民党内有号召力，只要发动反蒋，许多人都要跟我走。十九路军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军官都有爱国主义思想，他们同我都很有感情，现在我虽然脱离开队伍，但他们仍然是要听我的话的。”^[67]陈铭枢所考虑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进行？”他周围的一批人都对当时的国内政治不满，鼓动他出面反蒋，他们向陈建议发动民众，联络中共，并讨论了建立新党、新政府的方案。陈铭枢的欧洲之行为他发动福建事变作了思想、理论和策略上的准备。

注释

- [1][8][16][17][18][19][20][21][57][66]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 [2][3][5][6][7][10][11] 存萃学社编：《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香港1978年版，第454页；457-458页；460页；471页；481-483页；535页；536页。
- [4][9][14][26][29][62][63] 《蔡廷锴自传》，第256页；262页；272页；268页；274页；296页；306页。
- [12][22][23][24][25][31][64][67]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
- [13] 丘挺、郭晓春：《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 [15][51][56][61] 《申报》1932年1月10日；2月21日；3月4日；6月7-9日。
- [27][28][52] 邓世汉：《京沪卫戍公署见闻》，《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 [30][32][33]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91页；192页；186-187页。
- [34][36] 《革命文献》第36辑，台北版，第1429-1430页；1500页。
- [35][37][38][39][42][44][49][53][54][55][65]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99页；111-112页；112页；119页；166页；176-177页；182-184页；206页；316-317页；323页；340页；序言。
- [40] 《中央周报》第191期。
- [41][43][46][47] 《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 [4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515页。
- [50] 《王礼锡诗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 [58] 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版，第120-121页。
- [59] 陈铭枢：《“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
- [60] 《中央日报》1932年6月6日。